凡圣之维：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

王宗峰/著

文学文库
E WENKU

本书主要探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如《敌后武工队》《战斗的青春》《铁道游击队》《铜墙铁壁》《风云初记》《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旗谱》《三家巷》《红岩》等）在小说、电影、电视诸种媒介的不同展示，及其跨媒介转换中包含的丰厚的文化、文学思想。内容丰富，视角独特，给人以联想、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013059619

I207.42
9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藏书
图书馆

博学文库
BOXUE WENKU

凡圣之维：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

王宗峰/著

I207.42
91

北航 C1666668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013062961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圣之维: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王宗峰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3.6
(博学文库)
ISBN 978-7-5664-0416-9

Ⅰ.①凡… Ⅱ.①王… Ⅲ.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Ⅳ.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6796 号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中国'革命集体记忆'书写史研究(12CZW017)"之中期成果。

本书获淮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Fansheng Zhiwei Zhongguo Dangdai Hongse Jingdian De Kua Meijie Yanjiu
凡圣之维: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 王宗峰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52mm×228mm
印　　张: 17.25
字　　数: 20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4.00 元
ISBN 978-7-5664-0416-9

策划编辑: 卢　坡　　**装帧设计:** 张同龙　李　军
责任编辑: 卢　坡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序

研究“红色经典”是需要勇气的，因为这是一个有分歧、有争议的问题。有人将“红色经典”视为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与精华，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的财富与象征；有人则认为它是在怀旧情绪驱使下对以往“左倾”典范性文艺作品的一个称谓。有人把“红色经典”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革命运动和人民的真实生活联系起来；有人却把它看作仅仅是与那些“艰苦岁月”或“文革记忆”相连的一个“后文革”词汇。总而言之，在理论界、学术界，对何谓“红色经典”，对“红色经典”的基本理念、价值取向和风格范式上的认识，是不一致的。这就给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平台，论题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王宗峰先生的《凡圣之维：中国当代“红色经典”的跨媒介研究》，尽管不能说是全景式地研讨“红色经典”的方方面面，但该书通过对多部革命历史小说及其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及近年来的两次影像化改编活动的比照，以文学文本为参照系，考察两次改编活动分别驱除了什么、注入了什么、强化了哪些、弱化了哪些，动机和路数有何不同等，进而探析了特定语境中革命话语变迁的轨迹以及促成这种变迁的复杂原因。可以这么说，该书的这种研究视角，是能够让人比较清晰地看到“红色经典”蕴含的丰富文学和文化底蕴，也能够让人知晓产生“红色经典”的历史缘由和现实条件的。

尤为值得肯定的是，作者通过对革命历史小说和两次影像化改编风潮的具体解析，从多个层面指出了“红色经典”从小说到电影再到电视剧的演化，经历的其实是一个由“神圣”退入“凡俗”的改造过程。这一结论，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几十年来

“红色经典”所遭遇的命运，揭示了它在社会舆论和媒介中演变的基本轨迹与途径。作者一方面摒弃了一般存在的成见，发现“红色经典”小说在进行圣洁化建构中还是自觉地为凡俗生活保留了一定空间的，对英雄人物的凡俗之举也给予某种理解和宽容，即使是在电影改编中有“卡里斯马典型版本升级”的现象，但仍不失为高尚与平凡的组合；另一方面，作者又尖锐地指出了“红色经典”小说在电视剧制作中存在的普遍倾向，那就是随着意识形态上“神”、“魔”二元切分模式的日渐式微，各种典型形象都得到了“人性化”与“世俗化”的重构，“卡里斯马系统生态”明显地向凡俗之维倾斜，先前的神圣性和革命话语受到虚无主义的亵渎和解构。

我是欣赏作者做出的如下判断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规则和消费主义逻辑决定了文化产业对所谓‘红色经典’中凡俗因素的挖掘带有相当的功利性和投机性。可以说，凡俗因素正是近年来‘红色经典’被文化工业运作的文本基础。新的语境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制作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于是政治与商业达成共识，于是文化产业在其所租借的权力资源的护佑下暗度陈仓，试水前行，尽可能大胆地挖掘‘红色’资源中可供消费的元素，民间的、传统的及其他非政治性的凡俗因素被逐渐开发出来，但这种对政治的他异因素的发掘并非自然，而是受到了商业逻辑和诱惑或制约。”应该说这个判断是有感而发、切中时弊的。

艺术活动规律告诉我们，用市场化的商业逻辑去对待“红色经典”，改写作品的革命话语，满足某些群体的需求，必然会去要求尽量张扬和渲染所谓的“内在人性”，展示所谓的“人性深度”，必然会掩饰、淡化、瓦解、清除作品原有的阶级性，像先哲说的那样：令市侩的内容套上凡俗的外衣，给文学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这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本书正是因为紧紧围绕着“圣”、“俗”两个维度的变化，以“现代性”问题作为贯穿线，借助“革命伦理”、“宏大叙事”、“个体情性”、“凡俗生活”、“革命理性”、“卡里斯马”、“人性”、“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体”、“感性”、“欲望”等概念和术语，兼以运用艺术生产理论、意识形态批评、阐释学、叙事学、知识谱系学、场论等相关观点，编织了一张论述之网，进行了多角度的辨析，同时也显示了作者可贵的理论批判意识。

毋庸讳言，人类史和艺术史都已证明，革命并不总是厮杀和争斗，这当中也有炊烟，也有欢愉，也有诙谐，也有情爱。倘若把革命与这些对立起来，那只能是没有身临革命其境的人为了某种观念或某种利益而主观片面的臆想而已；反过来，革命过后也并不总是莺歌燕舞、卿卿我我、甜甜蜜蜜，这中间仍有冲突，仍有牺牲，仍有悲剧，仍有叛逆。倘若让这一切都与世俗生活绝缘，以为可以“告别革命”，那也不过是迷信市场的人的一厢情愿的幻象和心造的泡影罢了。这两种情况都是事实。由此观之，那种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将凡俗生活描写成“情欲”和“人性”的“展览馆”，同将革命生活描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圣贤村”，本是一样的教条思维，一样的僵化叙事模式。

作者无疑做了一项有益的工作。面对“乱花迷眼”的局面，如何厘清“红色经典”的应有品格和气质，如何认识对它的擅改和糟蹋，如何使“红色经典”发挥出精神与审美的正能量，该书都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

“红色经典”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传承“红色经典”的重任，落在了后来者的肩上。“红色经典”的接受和媒介的改编过程还在继续，不同的见解和认知还在陆续释放出来。因此，对“红色经典”的综合研究和演变跟踪研究，理应尽早提上日程。

希望作者在此书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丰富已有战果，在不久的将来将新的研究成果贡献在读者面前。

是为序。

董学文

于北京大学蓝旗营寓所

2013 年 6 月 5 日

目　录

前　言 …… 〔001〕

第一章　革命历史小说的凡俗空间 …… 〔034〕

第一节　凡俗生活与革命话语 …… 〔034〕

第二节　情爱生活的书写 …… 〔052〕

第三节　身体的意识形态书写 …… 〔075〕

第二章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提纯化的电影改编 …… 〔093〕

第一节　政治化的电影艺术场 …… 〔094〕

第二节　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和强化 …… 〔109〕

第三节　情爱生活的委屈 …… 〔125〕

第四节　卡里斯马典型的版本升级 …… 〔138〕

第三章　革命历史小说的电视剧改编 …… 〔159〕

第一节　今非昔比的社会文化语境 …… 〔160〕

第二节　生产的消费性指向 …… 〔169〕

第三节　改编的俗化倾向 …… 〔185〕

第四节　改编后的卡里斯马系统生态 …… 〔200〕

第四章　余论……〔216〕

第一节　革命伦理和“偶在个体”……〔216〕

第二节　欲望的叙述……〔233〕

结语：凡圣之维……〔251〕

主要参考书目……〔257〕

后　记……〔267〕

前　言

概念："革命历史小说"

"革命历史小说"应该说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尽管如此，并未影响学界对它的使用。依据洪子诚介绍，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已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概念出现。"1960年，茅盾在中国作协第三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的报告中使用'革命历史题材'这一概念时，不仅指《红旗谱》、《青春之歌》这类作品，而且也包括写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生活的《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大波》（李劼人）"[①]。就是说茅盾所谓"革命历史"所指较为宽泛，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延揽入围，但是，实际上在20世纪50～70年代，一般说到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所谓"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有些学者提出并使用了"革命历史小说"概念。黄子平指出，"革命历史小说"是其对中国内地20世纪50～70年代生产的大批作品的"文学史"命名，而这一概念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的目

① 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

的"[1]。不妨将茅盾所谓"革命历史"视为广义的"革命历史"，而与之相应的小说作品则称为广义"革命历史小说"；而将狭义的"革命历史"用来指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与之相应的小说则可视为狭义的"革命历史小说"。本书所及"革命历史小说"正是这种狭义概念所指，而且特指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一批长篇革命历史小说，后文将不再逐一说明。

洪子诚还列举了革命历史小说的主要作品，其中长篇小说有《铜墙铁壁》(柳青，1951)、《风云初记》(孙犁，1951～1963)、《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红日》(吴强，1957)、《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旗谱》(梁斌，1957)、《青春之歌》(杨沫，1958)、《战斗的青春》(雪克，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钢》(刘流，1958)、《敌后武工队》(冯志，1958)、《苦菜花》(冯德英，1958)、《三家巷》(欧阳山，1959)、《红岩》(罗广斌、杨益言，1961)等。[2] 这些小说中有许多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初几年间被改编摄制成电影，并形成一股电影化改编的风潮，而近年来，它们又纷纷被改编制作为电视剧，且又蔚然成风。[3] 本文所具体论涉的"革命历史小说"主要是洪子

① 参见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载《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6～107页。

③ 这股风潮并非只是影视界的现象，而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有着复杂的促成因素，它的产生就与其他领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比如20世纪90年代音乐界和新闻出版界对红色资源的青睐就不能不影响到影视界。就电视剧而言，这股风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渐起，而在2000年，万科影视公司拍摄制作了由外国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中国版同名电视连续剧，结果较为成功，于是，由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电影等文艺作品(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文艺作品)改编制作的电视剧跟风而起、一拥而上，于是这股改编风潮迅速涌动起来，而且这股风潮目前尚未结束，仍有持续之势，不少该类电视剧正在筹拍、拍摄或待播中，如由吴强小说《红日》改编制作的电视剧已经杀青待播，因受时间所限(本文截稿日期为2008年3月10日)，本文无法对此具体论述。

诚所列的这些长篇小说中的那些在这两次影像化改编中都曾被涉及的小说，但其意蕴则指涉这个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的总体，因为这些被具体论涉的小说因其影响和地位，作为“革命历史小说”的代表应是稳妥的。

与“革命历史小说”密切相关的概念就是近些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少领域被频繁使用的“红色经典”这一术语。有关“红色经典”的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既有广狭之分，也有深浅之别；既有出自官方的权力界定，也有民间的惯性指认；既有市场伙同媒体的炒作性描述，也有知识精英的学理性论涉。在“红色经典”现象已成沸沸扬扬之势，其“负面”影响已使官方不能坐视不管之时，国家广电总局于2004年5月25日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广播影视局（厅）、中央电视台、解放军总政宣传部艺术局、中直有关制作单位发出了《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在该通知中，“红色经典”这一关键词仅用括号加以注明：“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这应该算是官方对“红色经典”的指示性界定了。至于何为“较大反响”？又何谓“名著”？则只能依据各人的理解了。可见官方这一界定也并非十分确定，权威中不无张力。不管如何争论不休，认同也罢，质疑也罢，甚至否定，对“红色经典”的话语所指还是存在一定的共识性的，哪怕仅仅作为讨论对象。正如陶东风所言：“‘红色经典’的基本内涵大体一致：它一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关，是典型的革命话语。”[①]就所指而言，各种有关“红色经典”的界定都共识性地将长篇革命历史小说作为基本因素。这样一来，本书所提及革命历史小说，尤其是其中被影像化加工的这些小说也可较为合理地视为“红色经典”了，于是可以进一步认为关于“红色经典”的研究和论述也适用于本文所及的革命历史小说，而且常常可以

① 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置换。

有关革命历史小说及相关论题的研究状况

革命历史小说大约已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而对它们的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却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的事情（“主要是”意味着并不排除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前曾偶尔存在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文革”之前，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尽管为数不少，但因时代所限，难免有偏颇之嫌。“文革”期间，由于政治形势的严酷，革命历史小说研究中断。“文革”结束之后，文学界掀起了为当代文学写史的热潮。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对“文革”的全面否定也殃及了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对属于“十七年”文学的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自然也暂时搁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种现象才有所缓解，但由于当时文学环境仍然较为封闭，思维的惯性和眼光的局限导致研究者只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选择某个具体作家作品加以分析阐述，以浅层次的正面评论为主，很少能够做到整体把握，更谈不上宏观研究。1988年，王晓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发起“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对整个20世纪文学史进行回顾，并对文学史编写中的一些传统观念和标准提出批驳，旨在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论，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进行价值重估。新的历史观及文学史观的逐渐形成，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寻找到了新的起点和坐标，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也焕发新机。宋炳辉以其文《“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长篇小说〈创业史〉》首开重评先河，从新启蒙思想资源和审美主义出发，对长期盛行的狭隘政治视角以及庸俗社会学进行颠覆。[①]

① 参见王春艳《“红色经典”研究综述》，载《海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西方学术思想的大量引进所带来的开阔视野以及当代文学历史感的增强，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逐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不少学者采用了“再解读”的思路侧重于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方式、叙事特点、修辞策略和意识形态运作的轨迹等。这种颇具深度的解读对先前在特定语境中基于庸俗社会学和机械反映论之上的诸多僵化结论造成冲击。这类代表性著作主要有：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李扬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2～1976)》和《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唐小兵主编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蓝爱国的《解构十七年》、余岱宗的《被规训的激情——论1950、1960年代的红色小说》、杨厚均的《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新中国革命历史长篇小说再解读》等。

当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大量论文，分别从不同角度，采取多种方法对革命历史小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比如：人本主义研究、现代性研究、叙事学研究、审美研究、文化研究、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研究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丁帆和王世沉合作的《“人”和“自我”的失落》、旷新年的《断岩深处的历史》、刘保昌的《“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程光炜的《五十至七十年代文学“叙事”问题》、董之林的《传统叙事方法的重现与再造》、程文超的《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嬗变——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叙事》、马立新的博士学位论文《红色理性与革命战争文学》等。这些文章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给人启迪甚多，丰富了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理解和认识。

另外还有不少论文以所谓“红色经典”作为研究对象，而实质上依然是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如吴培显就在“红色经典”这一术语出现之后，将“红色经典”从“十七年文学”中独立出来

做专门研究，颇有首开先河之功。在其论文《“红色经典”创作得失再评价》中，吴培显对“红色经典”进行了反思，认为“红色经典”缺乏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历史合理性，“‘人’的哲学观念的根基的缺失，导致史诗范式的时代性倾斜”①。其他以“红色经典”为研究对象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还有：杨经建“红色经典”系列论文、张志忠的文章《定位与错位——影视改编与文学研究中的“红色经典”》②、刘玉凯的《“红色经典”与时代精神》、阎浩岗的《从文学角度看“红色经典”》等。这些论文基本上依凭今天的开阔视界对“红色经典”进行了宏观性阐释，术语的置换并没影响这些论文实质上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独特认识和深刻理解。

针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电影改编的文章并不算少，但基本上属于观后感或回忆改编制作“花絮”式的散篇，深度和力度显然不够，缺乏学术价值，其中许多根本称不上研究。尽管如此，这些文章却以独特方式留存了那个时代的话语和记忆，具有宝贵的材料价值。

针对革命历史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的学术文章很多，而且一度形成争鸣之势。这些文章往往将“红色经典”的再度活跃作为一种文艺或文化现象进行开掘，角度新颖，见解深刻，发人深思。仅举几例：

(1)陶东风在《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一文中认为：“‘红色经典’电视剧作为在‘革命’话语与商业话语、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之中求生存的特殊文本，成为官方机构与民间资本从各自的需要出发争夺、共谋、冲突相互交汇的场域，对此的解读有助于我们认识特定时期中国文化场的结

① 吴培显：《“红色经典”创作得失再评价》，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② 该文刊于2005年第4期的《文艺研究》，尽管提及“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问题，但主要还是针对革命历史小说进行探究，故置于该处。

构关系。”[①]该文带有明显的文化征候分析的性质。

(2)陈思和在《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中敏锐地指出,所谓“红色经典”在其兴盛的那个时代之所以受到热烈而真诚的欢迎,其中一个相当关键的原因就是由这些作品的“隐形结构”所致,“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唤起了他们原来的阅读知识和审美修养”。[②]

(3)刘康在其文《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中认为,“红色经典”在全球化时代的再度兴起有其历史必然性,显现了当代中国文化政治动态,并提出如何再造“红色经典”的问题,发人深省。[③]

(4)张法在《“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一文中认为,“红色经典”从表面上看,是让人回到过去,而从内在里讲,是引出了一种回不到过去的痛。[④]

(5)解玺璋在《有多少经典可以重拍》一文中指出,被“红色经典”改编风潮煽动起来的,“不可能是历史理性,只能是一种盲目性”;“它对观众的暗示,在观众的心理中形成或强化了所谓对红色经典的盲目崇拜”。[⑤]

(6)唐小林在《消费时代的“红色经典”》中,以“权力寻租”为视点,敏锐地探析了文化产业在“红色经典”改编过程中对红色权力资源的租借现象,并指出其归旨依然在于商业利益。[⑥]

(7)陈林侠的博士学位论文《叙事的智慧:当代小说的影视改编研究》分析了在后现代思潮中的互文性理论影响下的改编

---

① 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② 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载《南方周末》,2004年5月6日。

③ 参见刘康《在全球化时代再造“红色经典”》,载《中国比较文学》,2003年第1期。

④ 参见张法《“红色经典”改编现象读解》,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⑤ 解玺璋:《有多少经典可以重拍》,载《新闻周刊》,2004年4月12日。

⑥ 参见唐小林《消费时代的“红色经典”》,载《花城》,2005年第1期。

状况，其中对“红色经典”的改编思路和美学传统也进行了考辨。但因其题旨所致，基本上是就改编本身的问题进行共时性研究或横向研究。

当然也有针对“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风潮提出较为具体的改编之道的文章，如仲呈祥、周月亮在《论经典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之道》一文中，指出“红色经典”改编的弊端，认为“经典作品的改编之道，理应忠实于改编者对经典作品的灵魂和精神的正确理解，忠实于电视剧创作独特的审美规律，以此为基础寻求原作与改编者在审美风格、审美个性上的相通契合点”①，此论具有指导性价值。

诸如上述种类繁多的著作和文章尽管硕果累累，但其中并没有就革命历史小说的两次影像化改编风潮进行比照研究，而且到目前为止，就笔者所查，依然未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这就难免令人遗憾了。

本书的思路及规划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的创作尽管受到了基于革命现代性的主导意识形态的政治性规约和制导，但还是尽可能地给予非政治因素（往往是与神圣革命相异质的凡俗成分）以容身之地。但在它们被改编加工为电影的过程中，为了更加符合主导意识形态愈益强化的要求，原文本中的许多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的凡俗成分因为可能会稀释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度和力度而被弱化或驱逐，革命政治因素（神圣革命话语）则被强化，经过这种“政治任务”式的改造，被定制出来的产品（影片）具有明显的图解政治话语的倾向，原小说文本中的卡里斯马系统经过政治强化改造便更加符号化、脸谱化。

① 仲呈祥、周月亮：《论经典作品的电视剧改编之道》，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

也正是这种非政治的凡俗因素，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向市场的文化产业锐意挖掘的不尽资源，卡里斯马系统也在这种挖掘中被逐渐解构（当然，这种解构现象在“文革”结束后就已存在，而且并非只限于政治和商业原因）。以市场为导向的商业规则和消费主义逻辑决定了文化产业对所谓“红色经典”中凡俗因素的挖掘带有相当的功利性和投机性。可以说，凡俗因素正是近年来“红色经典”被文化工业运作的文本基础。新的语境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电视剧改编制作提供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于是政治与商业达成共识，于是文化产业在其所租借的权力资源的护佑下暗度陈仓，试水前行，尽可能大胆地挖掘“红色”资源中可供消费的元素，民间的、传统的及其他非政治性的凡俗因素被逐渐开发出来，但这种对政治的他异因素的发掘并非自然，而是受到了商业逻辑的诱惑或制约。比如对情爱及与之相关的世俗情感的开发就颇有急功近利的商业气味。

在这种语境中，“用商业的逻辑改写革命话语必然要求尽量张扬所谓‘人性’，淡化阶级性”①。这次较大规模的“红色经典”影像化改编风潮所尽可能挖掘的其实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影像化改编活动中所尽可能转化、遮蔽和抛弃的东西。如果说那个时代的特定语境剥夺了电影的主人公做平凡人的权利，那么，后者则尽可能让电视剧主人公做凡俗之人甚至庸俗之人再甚至恶俗之人；如果说前者用冰冷的理性尽可能地剥夺了主人公的世俗身体、情感、欲望等个体感性体验，后者则依据消费主义逻辑将这些因素脱离理性而尽可能地张扬；如果说前者对于主人公的编码是一种政治化的“附魅”操作，后者则是一种商业化的“解魅”运作；如果说前者对主人公来说是一种超越感性的理性提升，后者则试图以感性消解这种曾被神圣化的

① 陶东风：《红色经典：在官方与市场的夹缝中求生存》（下），载《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4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